



# 金融危机对城市农民工的影响

——关于典型城中村“广丰村”的调查报告

■易外庚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城市农民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直观体现就是收入水平的下降。从生存发展的眼光看主要体现在就业方面,这也是最为关键而深远的影响。从影响的生存环境边际因素看则体现在权益保护、子女教育、租住物价与消费以及社会保障的缺失等方面,这些综合起来也影响到城市农民工的心理安全感。针对上述调查结果,采取多种而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民工充分就业;建立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切实解决城市农民工城市生存发展的后顾之忧,是可行的策略。

【关键词】金融危机;城中村;农民工;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8-0222-05

易外庚(1971—),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事务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江西南昌 330077)

## 一、研究背景

“广丰村”属于典型的城中村,该村位于南昌市洪都北大道与湖滨南路北段相接处,地属南昌市东湖区贤士湖管理处永溪村下辖的汤家自然村,因该区域聚集了大量来自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的农民工而得名。

20世纪80年代初,因南昌市青山湖周边的堤坝修建及其他市政建设的需要,该村吸引了最初的少量外来人,开始大约有20人,他们说着当地人听不懂的同一种方言(广丰话),主要从事挑土、挖坑等体力活。这批“广丰村”外来者,揭开了“广丰村”的萌芽发展阶段。伴随着南昌市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外来人口的规模不断壮大,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该村开始对外来人口进行登记(暂住人口登记)。据治保主任介绍,当时的“广丰村”已经发展到200人左右的规模。这一群体在当时还比较混乱,基本可以分为两类:大部分的本分劳动者与小部分年轻懒散的“混混”,后者只要听说有新项目结算

的消息,就对目标人群进行敲诈,而当时政府的管理相对较少,部分人因不能忍受这种生存环境而离开。这种混乱状况持续了4—5年时间,这个阶段可以称为“广丰村”的混乱期。1995年后,随着政府管理的加强,特别是这个群体内部的不断分化,这一依靠亲情及友情建立的稳固群体得以生存,特别是在“民工潮”的大背景下,在地缘、血缘的基础上,这一群体犹如滚雪球样不断壮大起来。据最新不完全统计,现居住在汤家的广丰农民工在2700人左右,占汤家租住人数的60%左右,大大超过该村的本地人口(1000人左右),成为名符其实的“广丰村”,这个阶段一直比较稳定,可以称为“广丰村”的发展成熟期。

江西省广丰县有80万人口,但人均不足3分地,因此外出谋生成为这里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当地就被国家有关部门确定为全国劳务输出基地县。2008年该县近30万人离开家门外出务工,其中常年在外出务工创业

的有 19.274 5 万人。<sup>[1]</sup>广丰人也被外界誉为“中国的犹太人”、“江西的温州人”。“广丰村”的发展变迁历程充分展示了这一特定群体的特点,据村管理人员介绍,该村的广丰人有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韧性和吃苦耐劳的特质,虽然生存条件艰难,但是通过自身不懈努力,一部分广丰人也从原先的简单、劳累工作中逐渐分离出来。现在这一群体基本可以分为三类:少部分已经成为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私人老板,单独或合伙购买价值 40—50 万元的挖掘机,这部分人有 30 人左右;另一部分则为掌握一定技能的技术农民工,如泥工、漆工等;大部分还是从事建筑装修方面的敲、拆、搬运等重体力活。

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蔓延和扩大,最近一段时期许多企业,尤其是加工贸易企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经营环境面临更多困难,导致一些企业被迫破产、停产,甚至有些企业不得不破产倒闭,于是在我国很多城市出现了农民工提前返乡的情况。据相关媒体报道,我国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安徽、四川、江西、贵州、湖北等已有近千万的农民工提前返乡,而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

农民工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而逐步成长起来的新型产业工人,正确对待农民工不仅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公正与和谐,更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事业的全局。鉴于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对涉及农民工的问题要有充分的把握和认识,及早采取有力措施,将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工的风险降到最低。本课题研究“广丰村”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即是在金融危机这一特殊背景下进行的针对性研究。

2009 年 3 月,本课题组研究人员对“广丰村”进行了实地调研,调查采用设定好的结构式问卷,由课题组成员(6 人)入户进行一对一面访。在调查抽样中,我们采用住址等距抽样原则,对“广丰村”的租住人口,按照居住区分布每访问一户跳 3 户的方法执行,这主要出于以下考虑:(1)该区域的租住人口没有完全的住户名单,按名单等距抽样行不通,而按照居住区分布等距抽样也是抽样调查的常用方法,能够保证抽样的随机性原则;(2)据当地治保部门人员介绍,每户的平均居住人口为 3—4 人,因此我们按照  $2700/3.5=771$  户,并以  $1/4$  的等距抽样方法来获取有效样本。在本次执行中,访问对象 153 个,通过整理甄别,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142 个,有效样本率为 92.8%。同时在本次调查中,我们还对典型对象进行了开放式的定性访谈,以充实本次研究的定量数据,

尽可能做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定量部分我们采用 SPSS12.0 系统对数据进行分析,以下是本次的相关调查研究结果。

## 二、从人口学角度看样本基本情况

### (一)性别构成情况

本次调查的样本构成中,男性访问者为 112 人,占总样本的 78.9%;女性访问者为 30 人,占总样本的 21.1%。

### (二)年龄构成情况

调查样本的年龄构成中,26—45 岁占总样本的 64.7%;25 岁及以下的占 10.6%;46 岁及以上的占 24.7%。具体年龄构成情况见表 1。

表 1 年龄构成情况

年龄	频次	百分比
18 岁及以下	2	1.4
19—25 岁	13	9.2
26—35 岁	34	23.9
36—45 岁	58	40.8
46—55 岁	29	20.4
55 岁及以上	6	4.3
合计	142	100.0

### (三)学历构成情况

从样本的受教育情况看,总体受教育水平较低。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及以下的占总样本的 50%;初中文化程度的占 37.3%;高中及以上的仅占 12.7%。具体构成情况见表 2。

表 2 学历构成情况

文化程度	频次	百分比
未上学	9	6.3
小学	62	43.7
初中	53	37.3
高中	13	9.2
中专	4	2.8
大专及以上	1	.7
合计	142	100.0

### (四)婚姻及家庭状况

“广丰村”的群体特点是以家庭式结构为主,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调查显示,已婚的占样本的 90.8%,未婚的仅占 6.3%,离异的占 2.8%。而打工家庭人口(指在汤家居住人口)数量中,2—4 人的占到样本的 59.9%,个人家庭占 28.9%,5 人及以上的占到总样本的 11.2%;通过计算,这些打工家庭的平均人口数为 2.81 人。具体打工家庭人口情况见表 3。

### (五)样本的其他相关情况

表3 打工家庭人口统计

人口数	频次	百分比
1	41	28.9
2	22	15.5
3	23	16.2
4	40	28.2
5	12	8.5
6	3	2.1
7	1	.7
合计	142	100.0

(1)来源地。本次研究点在“汤家广丰村”，但并不是所有的对象来自广丰县。其中，来自广丰县的占总样本的74.6%，江西省其他区域的占22.5%，非江西省的城市农民工占2.8%。

(2)居住时间。调查数据显示，“广丰村”农民工居住时间以较长时间为主体，其中5年以上的占35.2%，1—3年的占24.6%，3—5年的占26.1%，一年以内的占14.1%。

### 三、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的影响

#### (一)金融危机对城市农民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金融危机影响的直观体现就是收入水平的下降；从生存发展的眼光看主要体现在就业方面，这也是最为关键而深远的影响；从影响的生存环境边际因素看则体现在权益保护、子女教育、租住物价与消费以及社会保障的缺失方面。综合起来，这些也影响到城市农民工的心理安全感。我们首先考察这些影响因素在金融危机下的差异性，在后面再进一步分析各分类的影响情况。调查数据显示，从金融危机对个人的影响排序来看，把就业（找工作）放在第一位的为104人次，占总样本的75.4%，而提及该项受到影响的则高达90.6%。排在第二位的是工资（收入）水平，其中有15.2%的受访者把该项放在受影响内容的第一位，有提及的则为82.6%。显然，“工资（收入）水平”与“就业（找工作）”本身具有很高的关联性，就业是收入的基本保障来源。排在第三位的是“子女教育”与“医疗”，分别占到总样本的48.2%。再次依次是：物价（42.8%）、租住（35.5%）、社会保障（29.7%）、权益维护（29.7%）、社会治安（29.0%）等。具体影响排序见图1。

#### (二)对就业方面的影响

“打工无前途，回乡没意思”，生动而形象地表明了当前农民工的处境。林先生，50岁，广丰人，初中毕业，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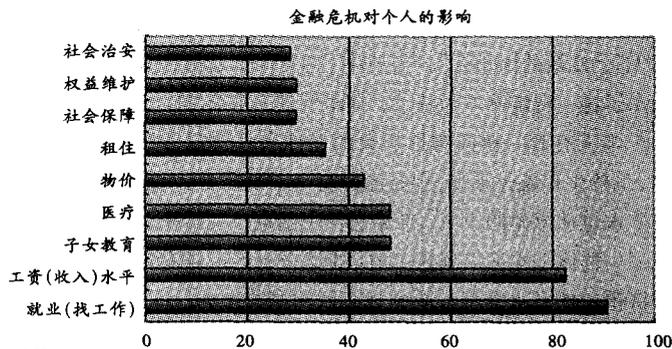


图1 金融危机对个人影响排序图

里有3人在南昌，他本人来南昌7—8年。在谈起金融危机的影响时他说：“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6点钟的时候就站在文教路口等工作。儿子是刚过年才来南昌的，现在还没找到事做，儿媳妇在青山湖书城给老板卖书，一个月收入600元。老婆在老家务农。现在赚钱非常难，最近22天做了5天的事，赚了400多元。虽然现在找事比较难，但是也不愿意回去，因为家里更苦，更赚不到钱。”（2009—03—14）“现在工作比去年难找，去年一个月能做15天，现在一个月只能做3天。现在也只能维持现状，不回家。在广丰，做一天事能赚20元，同样的事，在南昌可以赚到60—80元。”（韩锋，男，47岁，2009—03—17）

在调查数据中，认为在当前环境下“工作更难找”的占52.5%，认为“非常难找”的占31.9%，认为“影响不大”的占15.6%。在调查期间，南昌市连续（20多天）下雨，对于这些仅靠在马路边等待就业的群体来说，天气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广丰村”的“村民”多是街头散工就业形式，“雨天躲雨，晴天躲日头”是他们寻找就业机会的真实写照，这与农民的“靠天收谷”没有太大差异。

#### (三)对工资收入方面的影响

城里人不少群体的隐性收入可能大大超过正常的工资性收入，与此相比城市农民工的收入来源则非常单一。就业困难直接带来收入的下降，调查数据显示，收入下降很多的占36.9%，收入有所下降的占34.8%，没什么变化的占27.0%，有所提高的仅占1.4%。“家里就一个人在南昌，老婆在家务农，在南昌与老乡合租一间25平方米的房子。一个月收入1000元。吃饭要花600元，220元的房租两个人平摊，要出110元，电话要50元。一个月算下来要花760元，只能剩下240元。金融危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找工作，工作难找导致收入减少。去年

一个月能挣2 000元,现在最多只能挣1 000元。”(徐先生,男,50岁,在南昌时间近20年,2009—03—18)

#### (四)对消费方面的影响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最近3个月中,该村家庭(打工居住家庭人口)月均支出为1 350.68元(平均家庭人口为2.81人)。其中,食品类消费为702.09元,占总支出的51.98%,从恩格尔系数看还属于温饱阶段,食品消费占较高水平;其次是通讯、交通、购买衣物、医疗等综合费用为303.20元/月;再次是住房租金支出为210.12元/月;子女教育为126.11元/月;文化娱乐占的比例非常低,仅占总消费额的0.9%,为12.25元。与3个月前相比,消费水平总体上有所下降,因部分消费项是必不可少的,如房租、子女教育等,因此减少的项目主要还在日常消费中,如食品、通讯、交通、购买衣物等。在所有的受访者中,认为消费下降很多的占2.1%,有所下降的占34.0%,认为变化不大的占52.5%,有所提高的占11.3%。“一家五口人在南昌居住。妻子与自己一起随同做家务,大儿子今年学水电工,800元一个月,还没发工资。二儿子读幼儿园。自己在做散工,一个月收入1 000元,吃饭要花600元;小孩的教育要240元,有线电视5元;租了20平方米的房子,房租220元;水费6元/人,全家5个人共30元;电15度,一度8毛钱,共12元;两个小孩买零食要500元;电话费100元。去年女儿生病住院花了3 000元。现在想减少消费,但由于很多消费都是基本生活,没啥可减的了。”(林先生,49岁,2009—03—20)从不少受访者的基本生活条件及消费状况看,正如林先生那样,他们除了减不了的项目,其实可以减少消费的可能性已经很低,几乎减无可减。一些受访对象的租住房中还留有从家乡带来的大米和腌菜,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生活开支。具体应对措施选择详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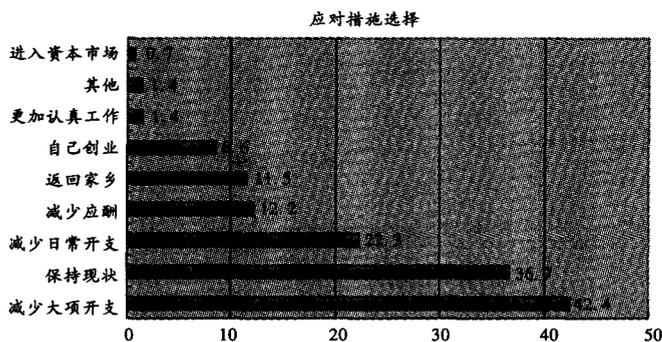


图2 金融危机下的应对措施

#### (五)对心理方面的影响

调查发现,金融危机对于城市农民工的心理影响呈现出很特别的现象:一方面由于现实状况有所恶化,他们表现出对在城市生存发展的巨大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又期待能够继续呆在城市,返乡并不是满意的选择,从预期看信心还是比较饱满。数据显示,承认城市生活的心理压力有所加大的占50.4%,认为压力增加很大的占25.5%,这种心理压力没有明显变化的占24.1%。虽然有着较大的心理压力,但是他们对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还是充满信心,“非常有信心”的占12.1%，“有信心”的占35.0%，“有点担忧”的占7.2%，“非常担忧”的占1.4%，也有44.3%的受访者认为“说不清/不好说”。

#### 四、解决城市农民工问题的应对措施探讨与分析

正如前面的调查结果显示的那样,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城市农民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影响最为直接的就是就业,并因此引起连锁反应。城市农民工由于本身的特有属性,如文化程度的低下、专业技能的匮乏单一性,在金融危机还没有见底的情况下,寻求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应对之策势在必行,这关系到广大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利益保护问题,也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谐发展。结合本次调查结果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分析探讨,本文试图通过对综合信息的分析思考,提出以下应对措施,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全社会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和重视。

##### (一)采取多种而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民工充分就业

就业是农民工的生存之本,“民工失业潮”可能引起城市与农村两处失火。农民工的稳定就业不仅关系着城市的发展,更关系着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稳定。

(1) 建立城市农民工的分类档案,并根据社会需要建立用工信息共享平台。

这对于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工,特别是以零散工形式就业的城市农民工有很大帮助。用工信息共享平台不是一句空话,信息共享平台可以在政府部门管理下设计建立,也可以由社会服务机构(但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来实现,城市失业除了经济发展的缘由外,很多是因为结构性用工需求原因,由于信息不畅而浪费所致,因而建立信息适时畅通机制,能引导农民工有目的寻找就业岗位,降低搜寻成本,提高求职成功概率。

(2) 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提高农民工素质。

调查发现,“广丰村”的城市农民工参加过培训的比例非常低,仅占受访者的7.7%,而且还基本属于非系统的基础技术学习,如油漆、司机等入门性技术学习,所有受访者均没有参加过任何有组织的系统就业培训。从各地企业裁减农民工的情况来看,被裁减掉的岗位多是一些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强的岗位。近期返乡的农民工中,大龄民工和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居多。这说明,农民工的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以适应更高层次的就业需要。对农民工进行培训,提高其技能水平和文化知识水平,是国家早就提出的一项战略决策。<sup>[2]</sup>相关部门和教育培训机构,可以利用农民工暂时失业的间隙,加大农民工培训投入,扩大培训规模,改进培训方式,毕竟,对失业农民工进行培训一方面可以大大缓解失业所带来的诸多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其实用技能和就业能力,为将来就业创造更好的条件。

(3) 加强对劳务市场的监督管理,切实做好公共服务。

为了更好地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政府应该在劳务市场管理和公共服务上作出更大的努力。在金融危机时期,部分企业出于自我保护或经营困难等多种原因,欠薪现象有所抬头,在本调查中就有这种情况的反映,一些工地的停工,使得部分农民工长期难以获取应得的劳动报酬。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在保护企业的同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如何得到保障的问题。

(4) 关心城市农民工的需求,特别是就业需求。

对于有继续在城市生存发展需求的农民工,要建立定期联系咨询制度,了解他们的就业困难,采取岗位补贴的形式来实现城市农民工的最大就业可能。<sup>[3]</sup>

(二) 建立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

随着我国劳动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农民工的各项劳动权益也日益得到保障。近几年来,农民工参与养老、

医疗、工伤保险的比例有所提高,这增加了农民工抵御各类社会风险的能力。但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还没有建立跨省区结转存续制度,使得农民工在输出地缴纳的各类保险费用无法带回自己的家乡,进而又不能在家乡享受社会保障服务。对于那些低于平均生活水平的农民工家庭,地方政府应该给予适当的救助,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三) 切实解决城市农民工城市生存发展的后顾之忧

制约城市农民工工作生活的因素既有现实的制度性障碍,也有城乡生活习惯、心理歧视等,所以,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sup>[4]</sup>城市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医疗保障问题、户籍问题等都制约着农民工的城市生活需要,虽然这些内容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现实问题一时还难以解决。就拿子女教育来说,南昌市宣布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取消借读费,这本来是好事情,但是现实情况却大大相反,原先有借读费可交,小孩读书只是花点钱,现在学校不收借读费,农民工子女必须通过各种手段才能进入学校就读。

【参考文献】

- [1] 江西广丰:建立代办员制度促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EB/OL]. www.jx.xinhuanet.com, 2009-03-10.
- [2] 李珂,高晓巍.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今日中国论坛,2009,(1).
- [3] 李文章.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就业[J].中国商界,2008,(12).
- [4] 张红宇,刘建水,张海阳.农民工对就业前景茫然——杭州市、绍兴县农民工返城就业情况调查[J].农村工作通讯,2009,(7).

【责任编辑:王立霞】